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 “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

——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为例

张鸿雁

摘 要 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不同国家之间社会与文化发展竞争的过程。任何国家与区域的城镇化都必然出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冲突与融合表现为三种典型形式:全盘西化并最终丧失自我;固步自封并最终形成单纯技术、资源或宗教主导型的畸形现代化;在全球和地方文化中找到平衡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力。“城市文化自觉”^①的建构是当代中国现代化遇到的典型而急迫的问题。一个国家与地区城镇化要想获得强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从“城市文化自觉”层面上进行主体建构:一是城乡一体化特色融合的文化建构与创新;二是人的现代素质形塑的文化自觉与创新;三是全球特色文化城市价值链高端介入的文化自觉与创新。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现代化示范区,江苏苏南地区创新“城市文化自觉”与“城市文化自觉”具有典型意义,对中国整体现代化和特色文化城市建设大有裨益。

关键词 文化自觉;新型城镇化;现代化;特色文化城市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3)11-0058-08

作者简介 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 南京 210093

在现代化和全球城市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城镇化过程中遭遇的文化价值缺失——这种外源性和内源性双向作用压力所造成的“文化迷失”只有依靠深层次的文化转型与创新来解决。^②

苏南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示范区,首先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能够率先表现为社会发展的特别是城镇文化的自觉,从乡镇经济发展创新开始,从小康社会奔向现代社会。其次是这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禀赋。苏南现代化示范区作为中国第一个以现代化建设为

主题和重点的规划区域,其文化转型在样本意义和经验价值上具有示范性和典型性,对其他地区区域现代化和区域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有积极的参考作用和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在新的社会发展变迁中,苏南文化转型和文化现代化必须围绕“城市文化自觉与城市文化自觉”双重创新的新思维方式上展开,在必须深刻认识“城市文化自觉”和“城市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求发展,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和弘扬传承区域城镇优秀文化,打造强可识别的区域城市文化身份和强可持续性的区域性的文化认同。

^{*} 本文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文化软实力提升对策研究”(2012ZDAXM0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2012&ZD029)的阶段成果。

一、自觉客体的时代性转换 “乡村文化自觉”到“城市文化自觉”再到“城市性的文化自觉”

区域现代化的核心是区域城市化,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曾提出城市是社会发展和发展的中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从城乡统筹的意义上认识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必须重视全球城市社会背景下的从“乡村文化自觉”向“城市文化自觉”,进而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示范区文化自觉”的主体转化过程。

在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城市文化自觉”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普遍共识,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全球的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进入了城市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完成了传统“乡村文化自觉”的过程。法国学者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③说明了传统农业文化自觉的转型过程,此书1964年出版时震惊了法国社会,虽然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仅仅20年的社会发展便证实了孟德拉斯的研判。1984年的法国虽然还有传统的农庄,但已经没有了传统社会意义上的农民,工场化、庄园化、机械自动化和、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发达国家的“乡村文化自觉”是在与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完成的。自此,“城市文化自觉”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1998年新加坡提出了“创意城市国家”的概念;2003年伦敦市长公布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reativity and culture)”的声誉,要把伦敦打造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a world-class city of culture)——其他如巴黎、柏林、纽约、东京、汉城等都提出了全新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充分反映了“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与价值。从发达国家“城市文化自觉”的创新中,可以充分证明从传统“乡村文化自觉”到“城市文化自觉”是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伴生的必然结果,但是,一个社会对于“城市文化自觉”能否主动认识,并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文

化行为,是需要理论与实践上进行创新的,更需要先行者提出倡议和呐喊。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讲,“城市文化自觉”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中国的城市人口在2010年就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至2013年已经接近7亿人,这意味着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城市人口,也在某种意义上告诉人们,中国社会问题的主体场域,也正在从传统的乡村和城乡差别矛盾的衍生中转向了城市社会场域,“城市文化自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费孝通论述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④这一理论和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反思中提出来的。中国从1849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里,城市人口只有10%左右,直至1978年也只有17.8%,到了1999年也只有30%左右,在理论上还处于典型的前工业化时代——而中国宋代经济最繁华时的城市人口达到过25%。由此看出,中国几千年来长期处于典型的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之中,而近代社会中国更是深陷传统落后农业社会的泥沼之中。提出传统乡村文化自觉和整体传统民族文化自觉,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性和建设性意义,而且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逻辑和国情的。

中国从1998年城市人口不足总人口的30%,到2013年超越52%,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而且中国的城镇化、城市现代化仍在深化和继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使文化自觉成为千千万万人的内在自觉和行为,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命题。“城市文化自觉”除了具有某种外部文化行为介入与唤醒功能的表现方式之外,更多的意义在于城市作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本身为文化自觉创造了社会基础。“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⑤——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

展观的重要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区别是就城市本身存在文化自觉的土壤和文化自觉的场域文化关系。城市作为一个适应性的开放系统,是世界文化、知识和技术流动的空间,也是新型人力资本的流动高地,同是又具有“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功能。“城市文化自觉”与传统乡村文化自觉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外部推动引发的自觉为主,而前者是内在文化场域关系构成市民社会的文化自觉为主。必须强调,任何形式的“文化自觉”都必然是与时俱进的文化自觉,是为了推动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所以这种“自觉”不仅仅是以认知、反思传统为自觉,更深刻的意义是:以反思、批判过去的同时,认知现实、建构未来也是一种文化自觉。但通常人们在谈论“文化自觉”的时候,只看到“我们从哪里来”,不关注“我们到哪里去”,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文化自封”。以往有些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是“乡土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以农村社会为主体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类型本身在全球城市化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完全表达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城市文化自觉”的完整性、有效性和客观代表性。^⑥全球城市面积只占地球面积不到1%,城市人口却占了世界总人口60%以上——全球范围内社会的主体形态已经开始从农村转变为城市。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就曾直截了当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⑦放眼当代全球化,任何现代化都必须在完成城市化的基础上实现,在这个层面上说,提出“城市文化自觉”是必要且紧迫的,城市和城市人的文化自觉应被予以更多的关注。

我们在论述传统社会时有一个误区,认为乡村代表传统社会,城市代表现代社会——从滕尼斯到迪尔凯姆再到吉登斯都提出过这种两极化的认知视角,虽然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描述具有学术性的解释价值,但是,从“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分析,这一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偏见。中

国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就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和繁荣,临淄城、楚都和苏州城都堪为代表^⑧,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且自成体系,城市史同样源远流长。如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内的五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南京)均有超过2000年的建城史,^⑨当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中心城市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很明显,苏南五市“城市文化自觉”的时间、起点、进程和速度及深度是不同的,但其“城市文化自觉”在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中的主动性和先行性的价值是相同的,具有典型的内在文化价值驱动性,并且作为区域社会发展的不同层级的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动力而存在。苏南地区县域经济发达,昆山、江阴等7个县(市)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县域前列——是中国城乡统筹建设较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苏南”不仅是一个地域范畴,也是一个文化范畴,^⑩无论是从历史的溯源还是从现实的需求角度来讲,苏南城镇化中的文化自觉与创新,是在汲取了传统苏南文化同时,在“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又创造了现代乡镇苏南和城市苏南新的城镇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从现代全球化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竞争的关系来说,中国苏南现代化示范区中的乡镇文化自觉仍需继续深化,而苏南“城市文化自觉”却更应该领先一步。正如前述,任何现代化的区域都是以城市为核心的,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必须实现完整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而城市现代化的核心是城市现代性的建构,城市现代化性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城市文化自觉”,让更多的人不仅仅能够自觉成为城市的主人——城市市民;而且能够成为现代化示范区的践行者、享受者和创新者。城市现代化建构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表现这特色文化城市形成的国际化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毋庸置疑,“城市文化自觉”是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创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集中表现方式之一。

二、自觉主体的进化论逻辑:从传统乡土社会到现代城市社会再到新型市民社会

我们主张从马克思提出的“市民社会”的意

义上来塑造苏南的“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必须重视从“传统的人”到“现代的人”进而到社会“样板阶层”群体的孕育过程。

所谓传统社会往往是自然经济文化的共同体,乡村文化是基于农业生产为主的、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体系而存在的。这个传统社会共同体内,农业劳动者是个体化的经济文化体,具有分散性和自我谋生的需求性,其居住的传统社会空间——乡村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没有异质性的社会群体,没有多样化的职业构成,也没有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他们的同质性在于都是自给自足、低教育的农业生产者,不存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技术阶层,更没有所谓的专业化的工商业者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乡村本身不存在典型的“文化自觉”的社会阶层载体——知识分子群体。因此,从历史发展经验看,这种提出主张和实践“文化自觉”的主体多不是农民本身,而是知识分子的理性行为和理想类型。另外,在历史文化发展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到,“城市文化自觉”是城市本身的价值与功能之一,正如经典作家曾经提出的那样:新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更多地产生在城市里而不是乡村,所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城市本身是一个具有“适应性开放系统功能”的有机体,同时又是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是“智识阶层”和“创意阶层”的集聚地——美国学者佛罗里达专门研究了全球城市发展的新型动力问题,明确提出了城市“创意阶级”崛起的社会价值与意义。^①在一些世界级城市和特色文化型城市里,存在着完全意义上的“创意阶级”,主要有工程师、科学家、设计师、教授、艺术家、小说家、演员、建筑师、银行家(金融师)、咨询师、医生、编辑、记者、评估师、网络专家、IT师、经纪人、策划师等,包括形形色色的先锋人物和各种各样的专家型“创意群体”。这一群体成为社会文化与“城市文化自觉”的创新力量,在改变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作为“城市文化自觉”的主体阶层的创意阶级——在现阶段的传统乡村社会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在这一新兴阶层的崛起中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自觉”存在

于城市本身的“自组织功能”之中,这也是城市与乡村区别的一种“质”的差异。正如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存在差异一样,“城市文化自觉”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也是有差异的。在现代社会竞争体系内,不同社会关系下的城市,其文化自觉的能力和能级是不同的,因此也需要对“城市文化自觉”本身进行倡导、呐喊甚或是奔走呼号,而费孝通先生就是这一倡导的典范。

“城市文化自觉”的创新意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1. “城市文化自觉”是城市核心价值建构的创新方式。世界和中国都已经迎来了真正的城市社会发展时代,在这个空前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科学的、本土化的城镇化理论的建构愈发重要。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城市强则国家强,城市兴则国家兴。在这个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语境中,城市不仅作为一个地域词汇,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时代词汇、功能词汇,甚至一个情感词汇而存在,是一种现代化的象征性表达,关系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普及,也关系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依附。创造内生性动力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而“城市文化自觉”是城镇化内生动力的核心价值表现方式。

2. “城市文化自觉”是引导传统社会文化自觉的动力。当下中国城镇化的研究表现出路径上的“倒序依赖”,无论是乡村城市化抑或是新型城镇化^②,还是城市现代化的进化历程,都是以制度型城镇化作为主要动力,政府仍然遵循着从“农村——城市”的行动逻辑。因此,有人认为在城镇化和现代化及文化自觉的发展模式上也可以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本身的逻辑性错误根源于对城市中心性本质价值认知的偏差。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文化自觉,在本质上都是城市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文化崛起无不是发生在城市之中,并引导传统农村的变革。城市社会进化本身如果不重视理论与科学论证,无论是在学理的研究认知上或是在行政管理的效率上,实际上都必须表现为高耗能的不经济的城镇化发展逻辑。中国的城市化尚且没有形成本土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不是城市建设被

覆盖在宏大的西方理念体系中,就是城市管理者挣扎在类似盲人摸象的茫然处境中——仅仅是寻求城市发展的政绩增长和路径依赖,而没有中国式“城市文化自觉”,这对于一个国家整体意义上的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来说是难以保持民族性和本土性的。

3. “城市文化自觉”理论与实践的显学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过程和结果。现阶段的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研究陷入一种特定的甚至是不可自拔的“隐形化境遇”。在城市人口已经超越农村人口的时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从传统农村社会已经转向城市社会,我们如果我们仍然单纯以农村研究中心,并且使“城市文化自觉”和城镇化等相关研究始终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的主体核心,而仅作为单一的学科视角——重复着一种古老而雷同的研究过程和结果,那这种研究本身就缺乏文化自觉的能力。中国的城市学研究事实上却被分解到经济学、规划学、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系统之中,没有明确统一的学术阵地——似乎被“碎片化”了。在中国的学科体制中,城市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而言本身就需要文化自觉,这才能真正创造一种全新的“城市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与文化价值链。中国差序化的梯度社会形态^⑬赋予了城市研究最为丰富的阶段性样本,“城市文化自觉”也表现为差异化的状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中国的城市化对于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造成最深刻的影响”的论断,其另一层理解就是“21世纪世界的城市研究在中国”!正如美国城市化大发展时期芝加哥学派能够兴起一样,中国的城市研究也已经迎来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要明确提出的是,在尚没有形成本土化城市化系统理论的中国,“城市文化自觉”的研究与运用,既包括社会“城市人”、城市市民整体上文化认知的自觉,更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学术与学理和科学与应用上创新“城市文化自觉”。

美国社会学者英格尔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⑭得出了“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⑮的结论。这一论断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

达,即国家现代化首先是国家的文化自觉,新型城镇化提出也是一种思想与文化的觉醒。一个有“城市文化自觉”表现的国家或地区,只有当她的人民能够成为现代人并且有某种市民社会的文化自觉,这才是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真正的动力。城市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表现出社会发展现代性——具有民主化和合理公平发展的土壤,它的民众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才具有某种现代人格特征,这种社会状态就有可能在社会制度与关系上表现出对人及人本原的尊重、对他人的尊重。聚焦中国苏南现代化的发展,其核心也必然是人的现代化,城市社会群体的文化自觉。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自觉应该从每一个人开始,每一个体都有责任、有义务对中国文化当中那些优秀的、合理的、文明的、符合“现代性”的文化进行重构和补品,并创造全新的“城市文化自觉”,把传统文化中与人类“大善”、“大爱”相符合的东西——包括仁义礼智信的文化继承下来并赋予时代的价值。苏南作为现代化示范区虽然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还应该更多地起到先导区的功能,而且能够从“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上,使苏南现代化示范区能够成为“中式城市文艺复兴”的发源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重拾、重缀、重整和重构。并且,要创造苏南当代智慧型的中产阶级、新型的“创意阶级”,通过“城市文化自觉”的建构,提升这一社会阶层的整体道德素质和文化价值,并使之能够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样板阶层”^⑯和“城市文化自觉”的先锋创新实践者。一般认为,一个地方或民族的现代化发展的质量,是与他们群体的文化自觉能力是呈正相关的。有学者认为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智力,但现有的文化因素却是决定文化发展的实质及速度的重要因素。^⑰“城市文化自觉”的深度和高度表现方式之一是城市的文化涵容性,而且也是建立在地方性文化的觉醒基础之上的。苏南样板阶层和新型“创意阶级”的构建,必须充分汲取吴文化刚柔相济的诗性气质和审美精神、民国文化中西合璧的艺术价值和博爱风范,通过群体性力量形成稳固社会结构和正向价值取向,创造新苏南的“地点精神”和特有的“城市文化自

觉”。

三、自觉文化的递进式建构:从城市文化资源到“城市文化资本”再到全球特色文化城市价值链

我们主张从“区域文化首位”的意义上来推动苏南的“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必须重视从“城市文化资源”到“城市文化资本”再到“城市文化价值链”的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同步整体现代化建设过程。

苏南是中国文化资源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苏南五市中有6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形成极核化的文化群落;苏南保留了以苏州园林、明孝陵、昆曲、古琴等为代表的世界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遗产的存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好的保证;苏南是中国文化群体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盛产状元和文化人物,两院院士也属苏南最多。苏南历史积累的核心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城市文化资本”是需要以文化自觉的方式来建构的,也就是说让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是需要一种文化再生产过程的,其前提是“城市文化自觉”。只有当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文化价值积累的时候,才能真正意义上创造社会进步的价值。公共性、历史性、价格刚性、民族性、可再生产性、可创造性及某种垄断性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最主要特征。^⑧创造性完成苏南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需要建立在对历史文化、文脉的挖掘与甄别能力之上,真正明确一个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核,还需要在“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创新地方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和操作模式,创新苏南文化输出的组合形态和社会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苏南城市价值网链重缀的过程。2012年,苏南地区GDP达到33381亿元,人均GDP突破1.6万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充分发挥文化对其他方面的辐射与核心带动作用,必须将“城市文化自觉”作为区域现代化、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的核心之一,实现苏南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同步整体现代化,提升经济与文化结构的自我成长力、反思力、扩张力和再创新力,进而

推进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介入的多层次战略,创造文化友好型社会。

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城市文化自觉”的内蕴涵之一就是如何创造城市经济与文化创新的土壤,让新事物、新型人才能够破土而出。“城市文化自觉”不是一个人的自觉,是一个群体、一种社会精神的自觉,这要求社会能够培育出精英群体,而精英群体是“城市文化自觉”的直接创造者、创新者和践行者。如“巴黎是一个有自己个性化城市文化的‘根’与‘魂’的城市。历史上辈出的文化精英,是巴黎人社会与文化精神生活的灵魂。这个城市有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普鲁斯特、波德莱尔、兰波、乔治·桑、肖邦、王尔德、科莱特、热奈;20世纪毕加索、本雅明、纪德、萨特、波夫娃、加缪、罗兰·巴特、福科这一些文化名人,组成巴黎社会文化名人群落,这个名人文化群,给巴黎人带来的不仅仅是骄傲,更多的可能是带来了心理暗示:或许每一个巴黎人者这样!巴黎不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容器,更是一个能够创造人类精神文化的策源的”。^⑨一言以蔽之,城市文化创新土壤是一种真正的创新,是克服保守、固化的文化与制度的一种结果,而当代中国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城市社会中的一些文化要素和文化行为甚至文化心理结构很多来自传统乡村,具有典型的乡村文化的“渗透性”,正如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工人很多是当时刚进城的农民一样,即使以工人阶级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在本质上还是秉持小农经济的文化意义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而在中国当代城市社会的发展中,我们的城市人口文化的“根”还是来自农村:1949年中国接近4亿人,当时城市人口不足10%;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左右。当代中国已经超过13亿人,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多数中国人的文化之“根”还在农村,我们当代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也多数来自农村并通过考试升学的通道走进城市。正因如此,本文才反复强调“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强调的社会新兴阶层的文化自觉的深刻意涵。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纽约。有学者说“纽约始终是一座‘文化大熔炉’、一个

新旧事物的交汇点、一种将新世界转变成美国所必需的催化剂。^①……纽约是最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城市……容纳着来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人们,这座城市使他们受到同化如此成功,以至每天有300人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纽约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被造就而成。作为一个还不错残酷筛选过的过程的幸存者,他们傲慢地坚信‘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更适合’他们。尽管存在种种矛盾和不幸,认为新世纪的挑战会击败这座令人赞叹的城市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②虽然对纽约的论断有作者个人的认知偏好并不能完全苟同,但是这一论述至少告诉我们,城市作为“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能够“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③一个城市的文化自觉是这个城市进化与进步的源泉,一旦社会整体对这一文化自觉有认同,其力量可以充分表现“城市化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价值,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文化自觉源于思想、源于情感、源于智慧、源于新的创意,源于千千万万人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参与和行动!

如前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和“现代性”生成的载体^④,是“社会进化的一个形式”^⑤。从“城市文化自觉”的角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现代化,其再发展和再现代化的模式至少需要关注以下七个维度:一是“区域资本再生产的能力”,特别是“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模式”和城市国际化经济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包括政策、空间、人才、要素、策略、服务能力的资本再生产的能级等;二是世界经济与文化因子吸收创新能力,包括对世界经济与文化前沿发展的把握,能够在广泛的意义上吸纳国际经济、文化要素及资本要素;三是国际化的开放程度,包括开放方式,表现为法制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关系,如国际自由贸易、国际化的资本结算、国际化的旅游地和国际化的生活空间等;四是国际化的人才集聚与流动,包括人才成长的优化土壤和机制,特别是“城市文化自觉”的主体阶层——创意阶层的打造和培育至关重要;五是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创造、创新能力,即对世界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反映、参与、创造和创新——在不同程度上能够走出去,吸纳、介入、参

与、创造和创新;六是通过反射世界经济文化,对苏南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再创造,创新在全球一体化中的本土化经济模式;七是区域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地方性精神与价值的传承与建构。^⑥

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自觉”,对中国现代化来说,有似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必须从新的社会理想和理论建构的高度来推动其发展,这种自觉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在社会充溢疯狂物质利益的时代,能够更多的推崇理想价值和主张,能够引导社会追求向上健康发展的目标,创造社会进化式的进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的实质在于最大可能地动员区域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关注城乡统筹、市民阶层、文化首位三大层面进而实现苏南文化现代化。

注:

- ①“城市文化自觉”的文化价值认知主要是吸纳了邵颖萍在《全球化与场域精神:麦当劳在东亚城市的“文化定制”逻辑》一文观点,见《社会》2013年第3期。
- ②张鸿雁、邵颖萍《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江苏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 ③张鸿雁、邵颖萍《苏南现代化的文化自觉与创新》,《新华日报》2013年8月13日。
- ④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⑤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 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⑦邵颖萍《全球化与场域精神:麦当劳在东亚城市的“文化定制”逻辑》,《社会》2013年第3期。
- ⑧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 ⑨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⑩南京: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后于秦淮河畔建越城,距今约2400多年。苏州: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约2500多年。常州:公元前547年,吴王徐封季扎于延陵,建延陵邑,距今约2500多年。无锡:公元前202年建县,属会稽郡,距今约2200多年(也有争议无锡为3000多年建成史:商末,泰伯筑城建都于梅里平墟,今锡山市梅村一带)。镇江:公元前1010年前,周康王封宜侯于宜地,建宜邑,距今约3000年。
- ⑪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琴译,中信出版社

- 2010 年版。
- ⑫城市化和城镇化在本质是一样的。见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
- ⑬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南京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 ⑭每个国家访问了 1000 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
- ⑮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⑯邵颖萍《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内核与核心》，《城市问题》2012 年第 11 期。
- ⑰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⑱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⑳⑳乔治·J. 兰克维奇《纽约简史》，辛亨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㉑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版。
- ㉒史蒂文·瓦格《社会变迁》，王晓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㉓R. E. 帕克、E. N. 伯吉斯、R. D. 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 ㉔张鸿雁《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战略》，《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1 期。

(责任编辑: 秦 川)

C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Zhang Hongyan

Abstract: Global moder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are three formats of conflict and fu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which is inevitable in any national or regional urbanization: The first is totally westernization and eventually losing itself; The second is isolation and abnormal modernization with simple technology, resources or religion as the dominant; The third is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wer by looking for the balance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cultures.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culture consciousness is a typical and urgent probl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ich contains three aspects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features,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human qualities and the high-end intervent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value chain. The innovation of c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South of Jiangsu area, which is the first state-level moderniz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 China, has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overall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c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new-type urbanization;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